

对澄城刘家洼墓地出土乐器的几点初步认识

○ 王清雷 孙战伟 张玲玲 种建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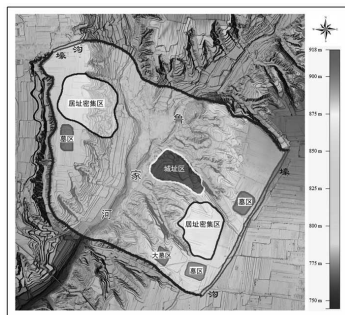
摘要:“2018年度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”之一的刘家洼墓地,出土了一些礼乐重器,如编甬钟、编钮钟、编镈、编磬、建鼓和钲等。该文通过对这些乐器的初步研究,认为有些发现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,如刘家洼M2出土的B型山字形磬为首次发现;M2这一座墓葬出土4件建鼓,是中国音乐考古学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发现;M1出土的钲初步判断其应为西周末至春秋初之器,是目前所见有关钲的最早实物之一;M2中钟铃与建鼓的组合使用,是目前考古首次发现的新现象。文章还认为M2的乐悬规制为轩悬。如果推测不谬的话,此为目前所见最早的轩悬之实例。

关键词:刘家洼墓地;乐器;初步认识

中图分类号:J609.2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2-9923(2019)04-0089-05

DOI: 10.13812/j.cnki.cn11-1379/j.2019.04.010

刘家洼遗址(见图1)位于陕西澄城县王庄



镇刘家洼村西北,分布于洛河支流长宁河上游的鲁家河两岸。2016年底发现有墓葬被盗,经申报国家

文物局批准,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市、县相关文博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,对遗址进行勘探和抢救性发掘。考古队重点发掘了包括周代诸侯大墓在内的两处墓地。根据出土文物的形制、纹饰等特征分析,可以认定该地为春秋早中期芮国后期的一处都邑遗址。

鲁家河穿遗址区中心而过,将遗址分为东、西两区。目前勘探发现墓葬共4处210余座,其中东区墓地3处,西区1处。东1区墓地共发掘

收稿日期:2018-09-07

作者简介:王清雷(1975—),男,中国艺术研究院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》总编辑部主任、西安音乐学院特聘教授。

孙战伟(1983—),男,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、刘家洼考古队副队长。

张玲玲(1992—),女,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,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》总编辑部编辑。

种建荣(1972—),男,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、刘家洼考古队队长。

基金项目:本文系201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“音乐考古学概论”的阶段性成果。

大、中、小型墓葬71座、车马坑2座、马坑1座。其中带墓道的中字形大墓2座(M1与M2),大型竖穴土坑墓1座(M3)。中字形大墓西北部各有一座南北向车马坑。西区墓地共发掘墓葬44座、均为中、小型墓,探明马坑2座,发掘1座。经过两年多的发掘工作,刘家洼墓地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,取得一系列重要收获与认识,对推动关中东周代考古乃至周代历史社会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,入围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,成功入选2018年度全国六大考古新发现。

刘家洼墓地出土的大量乐器,均发掘自东I区墓地(见图2)的三座大墓(M1、M2和M3)中。



图2

M1和M2均为带墓道的“中”字形大墓,均遭严重盗扰,人骨不存,墓主葬式不明。

M1出土乐器有编甬钟2套(现存10件)、编磬2组(现存10件)、建鼓以及钲。M2出土乐器有编甬钟2套(现存12件)、编磬(现存6件)、建鼓(4件)以及陶埙,同时还出土有钟簋、磬簋。M3为竖穴土坑大墓,虽然没有墓道,但其墓口与M1、M2的椁室大小相差无几。该墓亦被盗,现存编铎(5件)和编钮钟(9件)。从乐器种类来看,刘家洼墓地出土的乐器并无特殊之处,但仔细审视这些资料,有些发现却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学术意义,试述如下:

第一、编甬钟及钟簋

目前所知,刘家洼M1出土编甬钟10件,M2出土编甬钟12件。由于M1和M2均被盗掘,故其编列是否完整有待考证。编钟均为青铜质。其中,绝大多数保存完整,个别残破。钟腔横剖面为合瓦形。平舞,上置圆柱形甬,有的封衡,有的未封衡。旋斡俱全,有的为近方形斡,有的为半环形斡;有的斡为素面,有的斡饰绦纹。篆带

和正鼓部大多饰云纹,但细部不同。因为编甬钟均没有除锈,故有的甬钟纹饰不辨。M1的编甬钟已经清理出来,可以看到于口内壁有调音锉磨的痕迹,调音槽有多有少。经王清雷现场试奏(见图3)可知,有的甬钟可以发出清晰的双音,正、侧鼓音的音程关系或为大三度,或为小三度,可以判定为实用器。M2的编甬钟(见图4)仍在墓坑中未提取,是否有调音未知。尤为珍贵的是,M2(见图5)还出土有钟簋(2架),特别是西侧钟簋保存较好,长达5.3米,上有嵌蚌饰的木雕漆绘图案(见图6),下伏圆雕兽形簋座甚为壮观。这种工艺的周代钟簋为目前首见。如何将其复原将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艰难的新课题。



图3



图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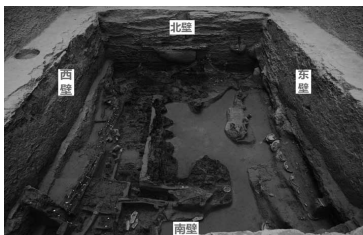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5



图6

第二、编磬及磬簋

据目前的发掘资料可知,刘家洼 M1 出土编磬 10 件,M2 出土编磬 6 件。由于两座墓葬均被盗,故其编列是否完整有待厘定。编磬均为石灰岩质。从器型来看,分为两型,A 型为传统的凸五边形磬^①,M1 编磬(见图 7)均属此型,M2 部分编磬也为此型。B 型为山字形磬,其特点是两博均为弧形。在两博与股上边、鼓上边相交处各有一个折角,与倨句一起大致构成一个山字形(见图 8),故暂称之为山字形磬,M2 出土的部分编磬(见图 9)属于此型。



图 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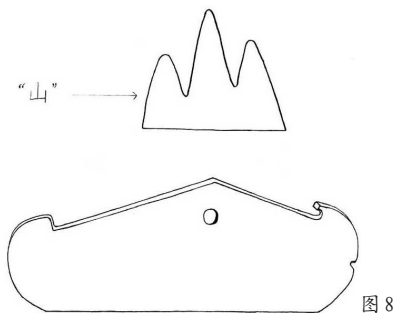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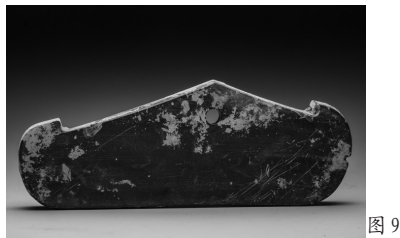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9

关于磬的器型,目前已有诸多学者进行过系统研究。《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》一书对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的磬做了深入的类型学研究,资料翔实,颇多创见。该书将这些磬分为 I 型(直背)、II 型(折背)、III 型(弧背)、IV 型(倨背)四型。I 型分为 I 1 式(横条型)和 I 2 式(竖条型);II 型分为 II 1 式(凸五边形)和 II 2 式(梯形);III 型分为 III 1 式(鲸头型)和 III 2 式(鲟头

型);IV 型分为 IV 1 式(钝角三角形)、IV 2 式(凸四边形)、IV 3 式(凸五边形)、IV 4 式(凸六边形),其中 IV 3 式又进一步细分为 IV 3a(平底)、IV 3b(拱底)、IV 3c(角底)三式。^②通过比较可知,刘家洼墓地 A 型磬属于其中的 IV 3b 式。对于刘家洼墓地 B 型磬而言,在该书中却没有与之对应的型与式。《石磬形态通考》^③一文通过综合考量磬的形制、纹饰、铭文、音律等要素,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清代的磬分为“模糊型石磬”“变革型石磬”“稳定型石磬”“美饰型石磬”,是目前有关磬的形态研究最为深入的一篇硕士论文。在“模糊型石磬一览表”中,该文按照其形制的不同分为 11 种,分别是类长方形(如夏县西夏冯特磬)、鱼形(如夏县东夏冯特磬)、类梯形(如五台阳白特磬)、类鱼形(如安阳虎纹石磬)、三角形(如安阳小屯虎纹磬)、长方形(如妊冉入石石磬)、类菱形(如巫山双堰塘石磬)、类五边形(如禹州阎砦石磬)、类六边形(如大司空村 991 墓磬)、类半圆形(如殷墟 93 墓石磬)、倒梯形(如郭家庄 160 墓磬)。在“变革型石磬一览表”中,该文按照其形制的不同分为 6 种,分别是五边形(如襄汾特磬)、类梯形(如平陆前庄特磬)、类鱼形(如安阳永启石磬)、半圆形(如扶风齐镇石磬)、类五边形(如秦公 1 号编磬)等。在“稳定型石磬一览表”中,该文按照其纹饰的不同分为 4 种,分别是素面(如浙川下寺 2 号墓编磬)、铭文(上如蔡商父之徵石磬)、花纹(如邳州九女墩 3 号墓编磬)、凤鸟(如江陵彩绘编磬)。在“美饰型石磬一览表”中,该文按照其形制的不同分为 12 种,分别是钝角矩形(如描金龙纹玉特磬)、曲尺形(如通州舒纓磬)、夔龙(如新疆玉磬-1)、云朵(如新疆玉磬-2)、素面(如三星堆石磬)、铭文(如涪陵特磬)、曲尺(如三

① 此为李纯一先生之命名,见《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96 年,第 31 页。

② 李纯一:《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96 年,第 31 页。

③ 王安潮:《石磬形态通考》,2003 年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,第 11-12、22、31-32、54 页。

台文庙编磬)、类三角形(如沁阳刻文石磬)、古琴形状(如汝州琴形玉磬)、折尺形(如武威文庙石磬)、葫芦形(如运城“泗滨浮磬”)、五边形(如天津青玉磬)等。通过仔细梳理这些资料可知,刘家洼墓地A型磬属于其中的稳定型石磬,却不见刘家洼墓地B型磬。其他相关研究文章还有《商代磬和西周磬》^④《西周磬研究综论》^⑤等,亦不见刘家洼墓地B型磬。

从对以上研究成果的分析可知,均不见刘家洼M2出土的B型磬。B型山字形磬为首次发现,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学术意义。

第三、建鼓(5件)

据目前的发掘资料可知,刘家洼墓地出土鼓类乐器共计5件,其中M1出土1件,M2出土4件(见图10)。这些鼓有的有鼓座,有的没有鼓座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即鼓身均有一根鼓杆(见图11、12)贯中而出。《礼记·明堂位》载:“夏后氏之足鼓,殷楹鼓,周悬鼓。”郑玄注:“足,谓四足也;楹,谓之柱贯中,上出也;悬,悬之簨虞也。”^⑥此处所谓的“楹鼓”就是指建鼓。如果按照郑玄所言“柱贯中,上出”的标准来看,刘家洼墓地出土的鼓



图10

均为建鼓。目前所知,春秋战国时期的建鼓主要有8例(大部分仅存鼓座),分别为陕西韩城梁带村M27建鼓(1件,春秋早期)^⑦、河南平顶山叶县旧县乡许国墓建鼓(1件,春秋时

期)^⑧、山西太原金胜村M674建鼓(1件,春秋晚期)^⑨、安徽舒城九里墩建鼓(1件,春秋末期)^⑩、湖北随县擂鼓墩M1建鼓(1件,战国早期)^⑪、湖北随县擂鼓墩M2建鼓(1件,战国早期)^⑫、江苏淮安市运河村建鼓(1件,战国)^⑬、保利艺术博物馆馆藏建鼓(1件,春秋晚期)^⑭。刘家洼M2这一座墓葬竟然出土4件建鼓,这是中国音乐考古学上前所未有的重要发现,其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均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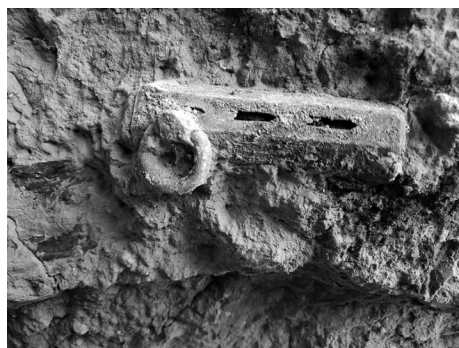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1

④ 方建军:《商代磬和西周磬》,《文博》,1989年,第3期,第36-45页。

⑤ 高蕾:《西周磬研究综论》,《南京艺术学院学报》(音乐与表演版),2004年,第2期,第48-54页。

⑥ 《礼记·明堂位》,《礼记正义》卷三十一,《十三经注疏》(下),北京:中华书局,1980年,第1491页。

⑦ 《陕西韩城梁带村两周考古又有重大发现(一)》,《宝鸡文理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,2006年,第4期,第61页。

⑧ 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、叶县文化局:《河南叶县旧县四号春秋墓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,2007年,第9期,第17页。

⑨ 侯毅:《鼓座、建鼓与战鼓》,《中原文物》,2006年,第4期,第49页。

⑩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(杨鸿霞):《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》,《考古学报》,1982年,第2期,第233-234页。

⑪ 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:《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,1979年,第7期,第6页。

⑫ 湖北省博物馆、随州市博物馆:《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,1985年,第1期,第17页。

⑬ 淮安市博物馆:《江苏淮安市运河村一号战国墓》,《考古》,2009年,第10期,第17页。

⑭ 孙机:《记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青铜鼓座》,《文物》,1999年,第9期,第87页。



图 12

第四、钲

钲(见图13),1件,出土于M1棺椁之间的南侧,北部紧挨编钟。青铜质。钲腔横截面呈合瓦形。平舞,圆柱形甬。甬上有一穿,可以悬挂演奏。器表所饰主纹为减地平雕的饕餮纹。初步判断其应为西周末至春秋初之器,是目前所见有关钲的最早实物之一。在刘家洼M1钲出土之前,有关钲的早期实物为上村岭虢太子墓铜钲(见图14)。1956-1957年,虢太子墓钲出土于河南陕县上村岭第1052号墓,其时代为春秋早期。^⑮钲保存完好。体腔横截面呈合瓦形。舞平,上置圆形甬,虽中空但不与体相通,甬上有一穿,可以悬奏。器身两面阴线云纹。通高25.7厘米,重2.45千克。^⑯《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》指出:“在I型钲中又以出土于上村岭东虢太子墓的例1年代为最早,山东沂水、湖南衡阳和安徽宿县等地出土的例2-4,不但年代晚,而且尽管它们在形制上有些细微的发展变化(如例2的悬孔为方形,例3、4体高的逐渐增大等),但都未脱离例1的基本原型。由此可以推知,钲可能最先出现于



图 13

中原地区的河南。”^⑰现以西周末至春秋初的刘家洼M1钲来看,“钲可能最先出现于中原地区的河南”的推断,仍有商榷的余地。

第五、铜铃与建鼓的组合

铜铃出土数量很多,器型多样,有甕铃和钟铃

等。所谓甕铃(见图15),其铃体一般为扁圆形,上面有镂孔,并有长方形的座。所谓钟铃,是指其器型如钮钟。铃体横截面为合瓦形。平舞,上面置环钮。于口

弧曲,舞底有铃舌。铜铃在M2出土较多,如北侧的车马器区,既有钟铃,也有甕铃。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在刘家洼M2的东南角发现有4件钟铃(见



图 15

图16)与1件建鼓放在一起。根据墓葬出土器物的组合关系,M2的东南角、南侧与西侧均为乐器区。故此,这4件钟铃的功能并非车马器,而为乐器,其应和建鼓配套使用。这种将钟铃与建鼓一起使用的乐器组合,是目前考古首次发现的新现象,再一次刷新了学界的认识。

^⑮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:《上村岭虢国墓地》,北京:科学出版社,1959年,第22页。

^⑯ 袁荃猷: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·北京卷》,郑州:大象出版社,1996年,第84页。

^⑰ 李纯一:《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,1996年,第319页。



图 16

第六、刘家洼M2的乐悬规制

《周礼·春官·小胥》载：“正乐悬之位，王宫悬，诸侯轩悬，卿、大夫判悬，士特悬，辨其声”，^⑮这是先秦典籍中关于周代乐悬摆列制度的唯一记载，但语焉不详。郑玄注云：“乐悬，谓钟磬之属悬于簏簴者。郑司农云：‘宫悬四面悬，轩悬去其一面，判悬又去其一面，特悬又去其一面。四面象宫室四面有墙，故谓之宫悬。轩悬三面其形曲，故《春秋传》曰：‘请曲悬，繁缨以朝，’诸侯礼也。故曰：‘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。’’玄谓轩悬，去南面辟王也。判悬左右之合，又空北面，特悬悬于东方或于阶间而已。”^⑯据郑玄的解读，根据等级的不同，周代乐悬的摆列方式分为四种：周天子为宫悬，摆列于四面；诸侯为轩悬（或曰曲悬），摆列于东、西、北三面，空南面；卿、大夫判悬，摆列于东、西两面，空南、北两面；士特悬，摆列于东面或阶间。刘家洼M2 椁室东北角建鼓铜柱套上刻铭“芮公”作器，下压的1件铜戈上亦有“芮行人”铭文，出土列鼎7件。据此判断，该墓主当为一代芮国国君。如果按照《周礼》所载的乐悬制度，该墓应为轩悬（或曰曲悬）之制。刘家洼M2出土编磬一架，编甬钟两架，可以摆成三面的轩悬之制。但从M2的椁室图来看并非如此，一架编甬钟摆在墓室西面，另外一架编甬钟和一架编磬摆在南面，构成一个两面的曲尺形，属于判悬之制，而不是三面的轩悬之制。

那么M2的乐悬规制究竟为判悬还是轩悬呢？这就涉及如何看待和解读考古材料的问题了。晋侯墓地出土了许多套编钟和编磬，有些编磬出土时摞在一起，既无钟簏，也无磬簏。如果

仅限于钟磬出土时的原有样态来解读的话，对于晋侯墓地这些没有钟簏和磬簏的钟磬来讲，其演奏方式就成了问题，难道这些钟磬就是放在地面上演奏的吗？显然不是。特别是，有些编钟出土时是从大到小套置在一起，有些编磬摞在一起，这样的样态又如何演奏？这种情况绝非个案，而是一种普遍现象。当我们面对着墓室中这一件件冰冷的礼乐重器时，要知道在它们数千年前是有“温度”的，它们见证了墓主钟鸣鼎食、莺歌燕舞的奢华生活，见证了墓主金戈铁马、刀光剑影的戎马生涯，见证了一个家族或诸侯国的崛起与衰落。由此，我们既要尊重考古材料的原始面貌，又不能仅仅拘泥于考古资料的原有样态，而应“以物论史，透物见人，替死人说话，把死人说话”。那么，我们再重新来看刘家洼M2。该墓室南北长7米，东西宽5米，虽然被盗，仍出土各类文物400件（组）。随葬品的摆放是按照其功能来分区的，西壁和南壁主要是乐器，东壁主要是礼器，北壁是床榻和车马器等，中间是主棺。限于墓室的狭小，最长的一架编钟置于西壁，另一架编钟和一架编磬全部置于南壁。在墓主现实的礼乐活动中，3架钟磬如此摆放显然是不合理的。首先，南壁的一架编钟和一架编磬前后摆放，有碍于墓主的观瞻。其次，将音量很大的一架编钟和一架编磬同置于一面，也不符合音响学的原理。如果将一架编钟或编磬摆于另一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。目前关于周代乐悬制度的典型实例是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乐悬。在曾侯乙墓墓室的中室，编钟摆列两面，编磬摆列一面，为轩悬之制，墓主为曾侯乙，正与《周礼》所载的乐悬制度相合。李纯一先生指出：“曾侯乙墓出土的这个战国早期曲悬实例，不但它本身相当完整，编次清楚，而且它的主人身份、国别和年代也都很明确，这就使得我们对于当时的乐悬制度，以及“礼崩乐坏”情况，能够有一些确实而具体的

^{⑮⑯}《周礼注疏》卷二十三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（上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0年，第795页。

（下转第113页）

述的“歌者”与“歌乐”的关系,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。但是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“协律歌谱”对于曲调进行的七“格”时,我们也发现这应该只是对于七“格”的形而下诠释而已,对于上升到审美意义的诠释上,“协律歌谱”的七“格”仍无法全面。虽然有此问题,但是李之藻注意到祭孔歌乐中相当重要的“歌者”并做出诠释,特别具有贡献。同时也藉此彰显“歌者”掌握好这七“格”,才能将歌词所传达对于孔子的敬意完全表达。由祭孔歌

乐可以衍伸到其他许多相关的祭祀歌乐歌唱,“歌者”应该具备的技巧与情感的表达,使所有使用古礼的传统祭祀歌乐,或许都能在此找到启发与借鉴,这也是朱载堉与李之藻对于后世祭祀歌乐的贡献之一了。

附言：本文得到台湾艺术大学中国音乐学系蔡秉衡教授的协助，特此感谢！

责任编辑:姚 岚



(上接第94页)



图 17

了解。”^②从曾侯乙墓椁室图(见图17)来看,编钟分别摆在中室的西面和南面,这

与刘家洼 M2 编钟的摆列方向完全相同,那么刘家洼 M2 南壁的编钟保持原地不动应是合理的。既然如此,编磬的移位就是必然。是否可以参考曾侯乙墓编磬摆在中室北面的实例,将刘家洼 M2 编磬也置于墓室的北面呢? 问题绝非如此简单,这是一个涉及钟磬乐悬摆列方向的大问题。首先要明确的问题是,仅以刘家洼 M2 和曾侯乙墓钟磬乐悬的摆放方向而言,《周礼·春官·小胥》郑玄之解读尚不足为信。刘家洼 M2 的钟磬乐悬摆列于西面、南面,并非如郑玄注所云摆于东、西两面,空南、北两面;曾侯乙墓钟磬乐悬摆列于西、南、北三面,也并非如郑玄注所云摆于东、西、北三面,空南面。那么,钟磬乐悬的摆列方向到底应该空哪一面呢? 如果我们关注一下主棺的位置,或许能找到答案。从“视死如视生”的角度

来看,刘家洼M2墓主应该是在棺的位置或是床榻的位置来欣赏“金石之乐”,那么摆放床榻的北面自然不能摆放钟磬乐悬。再看曾侯乙墓(见图17),主棺放在东室,墓主应该在东室欣赏“金石之乐”,中室的东面自然要空出来的。由此可知,钟磬乐悬摆放时所要空出的方位应与主棺(或墓主)的位置息息相关。刘家洼M2主棺放在墓室中间,头北脚南,面对墓道,墓主是在这个视角或是北壁床榻的位置来欣赏“金石之乐”,那么摆放床榻的北面可以排除,原置于南壁的那架编磬就只能摆列在东壁了。由此,刘家洼M2的西面、南面各摆一架编钟,东面摆一架编磬,可为轩悬之制。如果推测不谬的话,刘家洼M2的钟磬乐悬即为目前所见最早的轩悬(或曲悬)之实例。

以上是仅就目前的考古资料,谈了对刘家洼墓地出土乐器的几点初步认识。有关这些乐器的详细资料(如文字、数据、测音等)尚没有采集和整理。尤其是,待编钟、编磬、埙等乐器的测音资料采集后,将对其音列、音准和律制做进一步的研究,届时相信必定会有更为重要的学术发现。

责任编辑:姚 岚

②⑩ 李纯一:《曾侯乙墓编钟的编次和乐悬》,《音乐研究》,1985年,第2期,第70页。